

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人被清洗的問題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除了受到劉少奇問題的株連外，其實薄一波、楊獻珍等人早有「前科」：薄一波在大躍進以後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以及黨內許多

比較務實的幹部相一致；楊獻珍則因在有關「矛盾關係」的哲學命題上觸怒龍顏，早在1963年已經受到公開批判。由此可見，問題的癥結不在「紅區」、「白區」，而在於他們是否無條件地與毛澤東保持一致。

## 從馮客《開放時代：毛以前的中國》 看民國時期

### ● 鄭智文

於舉國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馮客出版一部重新檢視中華民國的書，從表面看有點不合時宜。但在此刻比較新、舊中國，以新觀點挑戰政治影響下的敘事，實在意味深長。



Frank Dikötter,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馮客 (Frank Dikötter) 教授的《開放時代：毛以前的中國》(作者暫譯,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以下簡稱《開放時代》, 引用只註頁碼) 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而言, 是十分及時的提醒。於舉國評價、慶祝、討論新中國六十年來的成敗得失時, 馮客出版一部重新檢視中華民國的書, 從表面看實在有點不合時宜。但在此刻比較新、舊中國, 以新觀點挑戰政治影響下的敘事, 實在意味深長。2011年是中華民國成立百周年, 馮客發表此書, 其實是早着先機。

馮書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中華民國(舊中國)的歷史, 並推翻大量對民國的既定印象。民國時期(1912-1949), 特別是國民黨掌權以前的民國初期(1912-1928), 素來被視為混亂的時代, 是現代中國革命/現代化的「過渡階段」、「陣痛」。此階

段經過國共兩黨的革命，以新中國的成立終結。當然，這種線性歷史已經被中外學者如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德里克 (Arif Dirlik)、拉里 (Diana Lary)、羅志田、米德 (Rana Mitter) 等所挑戰，而人們對中華民國的既定印象亦漸減，但民國史仍然有待全面檢視。馮書正好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的新思維與新方向。正如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指出，馮客對民國政治、經濟、文化與思想的研究「為一個已被歷史學家以為已死的歷史時代注入新生命」(封底)。馮客筆下的民國不是一個停滯、孤立與充滿壓迫的「黑暗時代」；而是一個進步、開放與多元的時代。

《開放時代》分四章：第一章「開放的管治」(Open Governance) 討論民國時期在混亂表象下的政治開放，而第二、三、四章則分別探討「開放的疆界」(Open Borders)、「開放的思想」(Open Minds) 與「開放的市場」(Open Markets)，從而指出中國在民國時期是如何與現代世界緊密接軌的。馮客認為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暫時中止了這個開放與國際化的時代，而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只是延續被壓抑的歷史進程。

在第一章，馮客推翻一個對民國政府的悖論，即民國政府既無能力安內攘外，同時又極盡高壓嚴苛之能事。魯迅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將已被馮玉祥與北京國民黨控制的北京政府描寫成黑暗的高壓政權，即為一例。馮客指出，民國在政治理念、行政架構、人事等方面與清末新政有一定的連續性，而在政治參與及政治多樣化方面，比不少當時的歐洲國家實有過之而無

不及；具體而言，清末改革以來，民國政府在司法與外交兩方面已有長足進步，而民國時期亦出現了公開的政治討論及參與。馮客又以清末民初的聯省自治運動為例，說明革命論述與暴力如何消滅民初的其他政治選擇(頁10)。

但馮客將1926至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視為中央集權與聯省自治之戰則略嫌籠統，因為從筆者對「國民革命」時期北方軍閥的戰略研究發現，部分北方軍閥如張作霖、吳佩孚等，一向支持中央集權，而於1925至1926年末擁有東南五省的孫傳芳則只視聯省自治為全國和平前的過渡辦法。筆者極為贊同馮客關於革命論述與暴力消滅民初的其他政治選擇的觀點，因為北伐時期北方一直尋求結束內戰並與南方國民黨共同重建中央政府的辦法，然國民黨堅持消滅北京政府，實行黨治，令中國失去和平統一的機會。

第二章與第三章論及民國時期中國人與世界的關係。馮客認為民初的中國比1949年以後的中國更面向世界。當時國人與外國人皆可自由出入中國，而國人對世界之興趣亦只有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可比。當然，國人皆痛切帝國主義與華洋不平等，然而，列強在華亦有益於中國的開放(如租界成為不少民國出版物的避難所)，而且亦有不少中國人於國際舞台上發揮不同的影響力。馮客認為，由於未有力量可以壟斷知識與權力，國人對外來知識、宗教、藝術均抱極開放的態度(頁54)。社會主義學說的傳入只是無數例子中的其中一例。

第四章探討清末民初中國經濟的發展。馮客綜合近來對民國經濟

馮客筆下的民國不是一個停滯、孤立與充滿壓迫的「黑暗時代」。他認為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暫時中止了民國這個開放與國際化的時代，而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只是延續被壓抑的歷史進程。

馮客挑戰中國革命史的大論述只是反思民國歷史的第一步。不論是否贊成馮客所有論點與論證，最重要者，《開放時代》一書向我們展示了民國史研究的可能性。

的研究，指出自清末新政以來雖然內戰內爭不斷，中國經濟仍持續增長，甚至連農民的生活亦得到改善，而城市居民則有前所未有的消費機會與選擇。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廠間接刺激中國經濟於二十世紀初快速發展。但中國市場並未被外國資本壟斷，而中國企業亦可與之競爭，其產品亦銷向世界市場。

馮客在結論中重申「民國時期是過渡階段」一說不確，並進一步指出毛時期對外封閉才是中國發展中的「不正常」階段，而改革開放只是回到本來一直在走的路。此說確否或許需要更多論據支持。馮客的結論其實與拉里於《中華民國》(*China's Republic*)一書的結論相類，即台灣雖然直至解禁以來在政治上依然專制，但仍保存了部分民國的開放傳統(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1)。

其實，馮客於各章的論點與例子於民國史研究者而言可能並不陌生，但少有如馮客者可以融會民國史研究的各方面並從整體重新審視民國。從另一角度看，馮書可說是近代英文民國史研究的長篇回顧與整理，而其書目簡介亦值得參考。但馮客在書中未有多引中文著作，尤其是近年重新檢視民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另一書評者指出，馮書未有提及米德在《苦澀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中對民國政治社會思潮的新論是一個小瑕疵(Kerry Brown,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www.upiasia.com/Bookshelf/923](http://www.upiasia.com/Bookshelf/923))。

馮客挑戰中國革命史的大論述只是反思民國歷史的第一步。其實類似想法早已見於中國學界。不論是否贊成馮客所有論點與論證，最重要者，《開放時代》一書向我們展示了民國史研究的可能性。馮客本人對民初監獄、消費文化等創新研究亦有助深化我們對清末民初社會的了解。雖然這些研究為我們展現了民國時期的開放與多樣性，但馮書亦間接指出民國史研究仍有很多空白與值得再討論之處。

例如，馮書指出，將「真心」(此語有討論餘地)希望實行聯邦制的地方實力派(如陳炯明)看成阻礙統一的「軍閥」實有欠公允，而要公平看待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則不可以被革命史話語所束縛；因此，有必要再探討曾經被面譜化的「軍閥」、「政客」、「官僚」，亦不應將所有重新審視民初政治發展可能性的討論定性為「翻案」。當然，研究民國人物(尤其是軍政人物)時需要特別小心，既要走出革命史話語，亦要避免過份美化，更要深化討論，不單看時人之思想行為，特別要再現時人所面對之實際困難以及在各種背景及決策過程中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態。雖然對民國軍政要人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筆者認為真正做到上述幾點的研究其實不多，而且研究方向依然偏向國共兩黨。

至於「開放的年代」於何時結束的問題，馮客認為，「開放的年代」於1930年代末中日戰爭以前達至頂峰，而後在1949年以後暫時中斷。筆者認為此點值得商榷。有論者批評馮客並未討論中華民國失敗的原因，並指出日本侵略是一個主要因素(Grant Evans,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71 [September 2008], 58-59)。米德亦持類似觀點，即日本侵華中斷了開放多元的新文化運動時代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2)。但筆者認為，至少在政治上，1925至1928年間的「國民革命」中已有「開放的年代」終結的端倪。

當時，國共兩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已系統地消滅多元社會：國民大會與地方自治只是口號；黨治以「訓政」之名實行；學術與新聞自由則首當其衝成為革命的犧牲品。黨國高層高談「黨化教育」，「總理遺教」與「三民主義」成為不可挑戰的信條；傳媒則面對史無前例的審查 (看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前後的《申報》即可見一斑)，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即列出被禁書刊的名單。國民大會未召開，而「附和」革命的地方軍閥隨即反蔣，引發1930年的中原大戰，其後內戰不斷。至1930年代，蔣介石甚至開始傾向法西斯主義。雖然1935年國民大會終於召開，但憲法能否制衡蔣氏仍頗成疑問。

筆者亦認為從1925年開始日漸激進的民族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功，實令中國於開放的路上退步。綜觀民國所面對的外患，民國政府的成就實在是令人驚訝。馮客不忘指出一個不無弔詭的現象，即「民國」成功保全了清王朝的「帝國」版圖 (頁10-11)。民國的邊界 (特別是東北) 一直面對侵略威脅，而列強在華的競爭亦為民初政局添亂。事實上，上至《二十一條》、中蘇協定、軍火禁運、海關、銀行團，下至傳教士、商人、駐軍，甚至租界巡捕，無不影響民初政治、經濟與社會。

馮書雖然指出「開放」帶來的好處，但筆者認為民國時期的「開放」依然需要置於當時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脈絡中。中國人絕對有理由對巴黎和會所承諾的「新世界」失望並感到憤怒：中國的關稅自主由於金法郎案一直被拖延，而收回租界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更看來遙遙無期。但筆者認為排外的「國民革命」與「革命外交」並非唯一出路。當時北京政府亦努力循和平方式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國民黨堅持消滅北京政府 (當時北京政府首領張作霖一直希望與國民黨展開對等和談) 與「北伐成功」後蔣介石堅持以武力消滅其他派系間促成了東北的淪陷，使中國於1930至40年代面對大規模侵略。當然，以革命史觀而言，北京政府的態度不啻與虎謀皮，絲毫無成功希望，但現實是否如此，尚待探討。雖然民國經濟與城市文化於「國民革命」後持續發展，但早於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以前，「開放的年代」實早已步向尾聲。

馮客教授對民國史的新論絕對有助於將我們從民族—革命歷史中超脫出來，亦對民國史研究起拋磚引玉的作用。雖然馮客少有提及香港，但筆者認為由於1949年後大量移民來港，加上殖民地政府對社會少有直接控制，民國的開放風氣在香港得以保存並落地生根。研究在香港的民國遺產於快速轉變的香港乃當務之急，而馮書對香港在中國將來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亦別有啟示作用。總括而言，雖然「開放的年代」對革命史話語的挑戰並非新論，但所論之全面精闢以一本僅約一百頁的小書而言，實屬難得，絕對值得一讀。

馮客對民國史的新論絕對有助於將我們從民族—革命歷史中超脫出來。總括而言，雖然「開放的年代」對革命史話語的挑戰並非新論，但所論之全面精闢以一本僅約一百頁的小書而言，實屬難得，絕對值得一讀。